

通義文史資料



通義文史資料

97.11.24.6

遵义文史资料

第六辑

(关于遵义会议)

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

内部资料 仅供参考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遵义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五年元月

目 录

- 遵义会议前后……………费侃如（1）
- 中央红军在黔北发动群众概述……………石金生 田兴咏（20）
- 红军在遵义日志……………费侃如整理（51）
- 娄山关之役……………顾大全（58）
- 回忆大战娄山关……………孔宪权口述 周珍元整理（72）
- 遵义战役中的北战场……………孙日铤（83）
- 红军佯攻贵阳调出滇军的战略战术……………顾隆刚（90）
- 红军长征过黔北时黔军三师堵击红军的回忆…朱振民（98）
- 我所知道的蒋三师二团……………陈绍培（120）
- 红军四渡赤水期间敌军兵力部署及战略意图概述……………石金生（124）
-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简介……………谢本书（145）
- 彭总与邓平……………郑心菜整理（151）
- 红军坟始末……………乔一民（155）
- 遵义是我革命的起点……………李锡成口述 郑心菜整理（158）
- 当年红军的总政治部——遵义天主堂……………关新（163）
- 红军一分队生活趣事……………冯开津（166）

红军守纪如铁.....	冯开津 (169)
回忆在“红军之友社”中的小事.....	冯开津 (170)
“红军之友社”的观感.....	余明璋 (173)
关于“遵义会议”的部分论述辑录.....	关黔新 (175)

遵义会议前后

费侃如

通道、黎平、猴场会议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红军渡过湘江，经湖南、广西边境苗、瑶等少数民族居住的越城岭山区，向湘西地域前进。红二、六军团为配合中央红军行动，对敌军发动了猛力的攻势，相继攻克了永顺、大庸、桑植，桃源、慈利等县城，并包围常德、直逼岳阳和长沙。蒋介石为了阻挡红军会合，立即调集五、六倍于我军的敌军，在武冈、城步、绥宁、靖县、会同和广西的龙胜一带，扼守去湘西的要道，构筑了又一道封锁线，以逸待劳，企图以重兵围歼红军于湘桂边境地区。然而，“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置不利于我的严重形势而不顾，还是机械地要向红二、六军团地区前进，坚持放下行李，然后才实行反攻；而不知按照已经变化的情况来改变自己的行动方针。红军处于有可能全军覆没，情况确是十分危急的关键时刻，十二月十三日中央军委纵队经平屯、芙蓉到达邵阳，毛泽东这时虽然被排挤在领导岗位之外，但他仍以高度的革命责任心，洞察全局，在中央负责同志会议

上，深刻分析了严重的敌我形势，积极建议改向敌人防御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使部队得以稍事休整，当时中央负责人迫于形势，在严重挫折以后，已经不知所措，只得接受毛泽东的这一正确建议。只有李德固执己见，坚持要按原定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向北前进，他认为：“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肖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①这时，连博古也认为“从贵州出发可以一直向北，在那里才真正有可能遇到很小的抵抗。”^②在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的赞同和积极支持下，不顾李德的反对，红军迅速按毛泽东的意见分两路向贵州进军。

红军突然放弃了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改向西进，这一行动把蒋介石的主力 and 湘敌大部军力，远远抛在湖南西部地区，使红军摆脱险境，化险为夷。刘伯承曾经指示：“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三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这就是红军长征史上著名的通道转兵。从此，毛泽东实际上又重新回来参与指挥红军了。

红军西进贵州后，前卫部队红一军团二师六团于十二月十四日，经猫圹、潭溪、五里桥直趋黎平县城；中央军委纵队从邵阳出发，经洪州司、地青、中朝所，于十七日到达黎平县城。

为了纠正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坚持去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的错误，中央军委纵队十七日进驻黎平县后，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城内召开会议。会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向贵州进军的正确主张，同时，对红军入贵州后的战略行动方针进行了讨论，“李德要在黔东南和敌人硬拼，毛

泽东同志则主张向黔北走。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同志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③十二月十八日，作出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即黎平会议决议）。《决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的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从组织上进一步肯定了毛泽东向贵州进军的正确主张。这是党中央在重大战略决策问题上，自宁都会议后第一次接受毛泽东的意见。这一成果，体现了党的高级干部的意愿和指战员的要求，成为纠正“左”倾错误的开始。会议还确定了进军中的作战方针，“在向遵义方向前进的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

黎平会议期间，军委为了充实战斗部队，紧缩机关，开始克服混乱现象，下令撤销红八军团的建制，将所部并入红一、五等军团；军委一、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

黎平会议后，十二月十九日，中央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和副主席、总政委周恩来立即签发了军委关于《为建立川黔边根据地军事行动的决定》，向部队下达进军命令：以红一、九军团为右纵队，在占领剑河后，沿清水江南岸向上游前进；以红三、五军团及军委纵队为左纵队，经岑松、革东到台拱及其以西地域；十二月底，“右纵队有占领施秉地域，左纵队有占领黄平地域的任务。”十二月二十六日，

二十八日，右、左纵队先后攻占了施秉、黄平县城，并向黎平会议所预定的新苏区根据地的乌江南岸地域挺进。

十二月底，红军大部到达乌江南岸地域，这时博古、李德、“又不知按照新的情况变化提出在川黔边转入反攻消灭蒋介石追击部队的任务，而只看见消灭小部黔敌以及消灭所谓土匪的任务。”为此，中央政治局又在瓮安县的猴场（草扩）举行会议，并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通过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该《决定》强调指出：“立即准备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内转入反攻，主要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如薛岳的第二兵团或其他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区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否定博古、李德主张红军不过乌江，回头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意见，重申创建川黔边根据地并准备向川南发展的战略方针；同时，会议还否定了“左”倾领导者主张红军消灭小部黔敌和所谓土匪部队的战斗任务，提出红军应以运动战转入对蒋介石追击部队的战略反攻；为此，会议再次提出部队要继续缩编并加强政治工作。

猴场中央政治局会议还特别规定了今后“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把这一规定写入了《决议》中。从而进一步对仍然控制着军委指挥大权的李德在组织上作了约束。这条规定，实际上“那时在中央局工作的主要的成员，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④这次会议开始加强了党对军事指挥工作的集体领导。

由于猴场会议为红军指明了渡过乌江后的行动方针，就在会议作出决定的当天，军委即向广大红军指战员发出了“打过乌江去！”的战斗口号，分兵三路，开始强渡乌江天险。左路，三军团从遵义县茶山关渡口过江；中路，军委纵队，一军团二师及五军团，从瓮安县江界河渡口过江；右路，一军团（除二师）和九军团从余庆县回龙场渡口过江，全线突破敌人自恃“重迭而坚，官兵勤劳不懈，挽险固守，可保无虞。”的百里长的江防工事。

一月七日，红军全面控制了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域，一军团二师同日进驻遵义城。

从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到猴场会议，集中反映了中央政治局和军委内关于战略方向和战役、战术问题的争论，说明了红军在攻占遵义之前，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已得到了党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同志的支持和拥护；“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的错误主张，一次又一次地遭到中央多数同志的反对和否定。实际上，黎平会议后，毛泽东已经开始参与了对红军的指挥工作。这样，为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开，不仅在思想上作了准备，而且为调整中央领导成员在组织上奠定了基础。

遵义会议召开经过

一九三五年一月九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随同军委纵队进驻遵义城。这时，一军团已进抵桐梓、松坎一带；三军团驻扎在遵义以南、乌江以北一线；五军团在遵义东南、团溪一带；九军团在湄潭（一个团在绥阳）一线，警戒着遵义东、北。各部均已暂时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党中央得以

利用部队休整时间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召开，“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召集的。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在：（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自从通道改变原定与二、六军团会合计划后，建立苏区根据地和如何打破几十万敌军的围攻，已是党中央和军委在阵地大转移的战略行动中，急待解决的中心问题。如果党不能及时总结红军第五次“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与长征以来在军事问题上的是非问题，红军就不能胜利地继续进行，必然还是不可预计的漫长的战略大转移，甚至在征途中随时都有被敌人歼灭的危险。这是关系着党和红军的命运，决定中国革命前途的最紧迫的问题。因此，当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各军团负责人都到遵义后，政治局扩大会议遂于一月十五日在老城红军总司令部驻地举行。这里原为国民党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家的官邸，是幢用灰砖砌成的两层楼房。会议室就设在楼上东厢房（原房主的会客室）

出席会议的有随一方面军长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军总部及各军团主要负责人，他们在参加会议时的党内外主要职务是：

政治局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毛泽东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朱 德 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

陈 云 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长征开始时为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治委员，遵义警备司令部

政治委员

周恩来 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兼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长征开始时为“三人团”成员

张闻天 （洛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

秦邦宪 （博古）红色区域中央局的领导者，长征开始时为“三人团”成员^⑥

政治局候补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稼祥 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邓 发 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刘少奇 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长征开始后先后为八军团、五军团中央代表

何克全 （凯丰）共青团中央书记，长征开始后为九军团中央代表

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

刘伯承 红军总参谋长、长征初期兼五军团参谋长，军委纵队司令员，遵义警备司令

李富春 中央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

林 彪 一军团军团长

聂荣臻 一军团政治委员

彭德怀 中央候补委员、三军团军团长

杨尚昆 中央候补委员、三军团政治委员

李卓然 五军团政治委员

邓小平 《红星报》主编

李 德 （奥托·布劳恩）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
长征开始时为“三人团”成员

伍修权 李德的翻译

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蔡树藩因部队没有渡过乌江，未能参加会议外，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也未出席会议。

会议一开始，博古代表党中作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即正报告）。他在报告中把这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力量的强大；强调当时白区反帝反蒋运动没有显著进步，瓦解敌军的工作做得差，游击战争开展得更不够，各根据地互相配合不够密切；夸大了根据地的后方物质供应工作没做好等客观原因。他对于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他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强词夺理，缺乏应有的认识，并为其错误辩护。

接着，周恩来代表军委作军事工作报告（即副报告）。周恩来在报告中客观地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以来的全面情况，实事求是地指出：这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确有各种客观原因，但严重的损失总是事实，我作为军事计划的最高领导人，是应该对此负责任的。他在批评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之后，强调指出：红军正面临着不次于第五次反“围剿”时的严重敌情，只有调换错误的军事领导，让善于运用运动战的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不管今后的道路还怎样艰难困苦而又遥远，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周恩来长时期担任党和军队的重要领导职务，在党内、军内享有很高威望，他的态度震动了会场，使与会同志在敌人正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十分危急中，看到了红军得救而一定会取得胜利的光明前景。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的长篇发言，对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他用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时敌我情况，说明第五次反“围剿”未能打胜的主要原因。他指出：第一次反“围剿”时，敌军是十万，而红军只有四万，是2.5比1；第二次反“围剿”：敌军二十万，红军四万，是5比1；第三次反“围剿”：敌军三十万，红军三万余，是10比1；第四次反“围剿”：敌军五十万，红军五万，是10比1；这四次反“围剿”斗争，不是都取得了胜利吗？而第五次反“围剿”：敌军五十万，红军五万余（不包括地方武装），仍然是10比1，为什么却失败得那么惨重呢？！这难道不是主观上军事战略指导方面的错误所造成的吗？他还指出：前四次反“围剿”斗争时，各根据地也是被敌人分割的；根据地的范围比第五次反“围剿”时还小；瓦解敌军，白区工作的开展也很有限，为什么我们红军却取得了很大胜利呢？！毛泽东强调指出，根据地的人民，通过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后方支前工作做得是很出色的；根据地内的土地革命，经济建设蓬勃开展，在“一切为了前线上的胜利”的口号下，广大群众积极参战支前，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当时扩红运动形成了热潮，十万工农积极分子武装上前线，红军力量空前扩大；而前方红军财政、粮食和其他物质上的需要，都得到了供应和保证，能说后方支援不力吗？！毛泽东据理驳斥了博古在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他还尖锐地批评李德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还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路、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略图上一划，限定时间

打,当然打不好,是瞎指挥。会上“毛泽东讲得很有道理。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⑦“毛泽东同志批判了当时错误领导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先是冒险主义,继而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⑧毛泽东有意识地着重批评博古、李德在军事战略方面所犯的错误,但对政治方面的错误没有批评和清算。这是由于当时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不一致,若提出政治方面的问题,一些同志肯定不同意,不接受,势必会引起无休止的争论,而影响大局,影响当时的长征,甚至影响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的解决。因此,毛泽东的发言受到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热烈拥护。

紧急着发言的是王稼祥。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严厉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积极拥护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张闻天在会上作了系统的发言,批评“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领导方面的严重错误,极力主张改变军事指挥人,赞同毛泽东在会上的发言。

朱德怀着激愤的心情,声色俱厉地追究临时中央领导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的错误,谴责他们排斥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而依靠李德,弄得丢掉根据地,极大地削弱了红军,牺牲了多少优秀的指战员。他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朱德在会上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坚决拥护毛泽东为我党领袖;他最后表示:我从井冈山开始,就是跟着毛泽东革命的,今后我永远跟着毛泽东革命到底!

刘少奇、李富春在会议过程中,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指挥,也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刘伯承、聂荣臻、彭德怀等红军直接领导人，深有感触地在会上对军委领导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军委在指挥作战时过于集中、具体，常常由于敌情变化，军团的指挥不能独断专行，失去了许多有利于我的战机；还指出军委在指挥上不灵活，要求部队机械地执行分兵把口，搞短促突击，使红军行动失去了机动性，致使在敌人工事的密集火力下造成很大伤亡。特别是聂荣臻提起李德的瞎指挥就十分生气，他指出，李德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一类连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都要横加干涉。军团指挥员们说，以上有的意见，曾在前线向军委建议过，但都未被采纳；而且很多意见是不敢提的，甚至根据战场实际情况变动了军委布置打了胜仗，也吓得睡不着觉。怕提了与军委不同的意见，就是对战争的动摇，机会主义、反革命帽子吓人。军团指挥员们表示，衷心希望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坚信部队在毛泽东领导下，一定能够摆脱当前的困境。

会议上大多数意见是批评李德、博古，在整个会议进行中，李德常常坐在会议室的过道上，不断地抽烟，垂头丧气，神情十分沮丧。有时，李德也为自己及博古在军事上的错误辩护，不承认自己的错误，把责任推到客观原因和别人身上。他看到会上要求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已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只得硬着头皮听取大家对他的批评发言。

博古虽然得到与会同志的批评和耐心帮助，但仍对自己领导军委工作中的严重错误缺乏应有认识。

凯丰在会上表示不同意毛泽东等同志的意见，还硬说毛

泽东过去领导红军粉碎敌人多次“围剿”的军事战略都是从孙子兵法上学来的，现在用不上了；毛泽东接着问他：你读过孙子兵法没有？你知道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问得凯丰哑口无言，非常难堪，因为凯丰本来就连孙子兵法这部书也没见过。凯丰只好提出博古虽然在领导军事工作中犯了错误，但不要撤他的职。凯丰的这个意见软弱无力，引起会场上一片笑声。

一月十五日，三军团六师在刀靶水、螺丝堰遭黔敌进犯，彭德怀只好提前离开会议，赶赴前线指挥所。

扩大会议最后一次指出：博古“对于华夫（即李德）同志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上的错误以及军委内部不正常的现象，不但没有及时的去纠正，而且积极拥护助长了这种错误的发展，……博古同志在这一方面应负主要的责任。”^⑨又鉴于“他的结论中对于绝大多数同志的批评与自己的错误是没有承认的。”^⑩为此，会议决定在组织上作部分调整：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快结束时，博古对会上同志们的批评意见，还“说要考虑考虑，毛泽东同志说我赞同你考虑，你考虑的不是继续留下，而是把职务交出来。”^⑫会议同意博古保留还要考虑的意见。

“扩大会议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扩大会议进行过程中，还讨论研究了当时形势以及会后红军的战略方向。刘伯承和聂荣臻在会上建议：“我们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因为四川条件要比贵州条件好的多。从我到贵州看到的情况，这里人烟稀少，少数民族又多，我们原来在贵州又毫无工作基础，要想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实在是太困难了。而到四川，一来有四方面军的川陕根据地可以接应我们；二来四川是西南首富，人烟稠密，只要我们能够站稳脚根，就可以大有作为；三来四川对外交通不便，当地军阀又长期有排外思想，蒋介石想往四川大量调兵不容易”。扩大会采纳了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会议最后作出了《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重新肯定了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取得多次反“围剿”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明确指出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及退出苏区后遭到的严重损失，其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违背了这一系列基本原则，犯了根本性质的错误。

遵义会议是在敌我兵力10与1之比，弱军被包围的极端危急形势中举行的。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